

形式与意涵的多元化*

——论两宋考古资料中的十二生肖像

● 邓 菲

摘要:本文以两宋时期考古出土的生肖图像为研究对象,讨论该题材在10世纪以后的发展、变化、时代及区域特征,试图理解十二生肖像在丧葬艺术中呈现出的复杂表现与多重的意涵。这种源于北朝、盛行于隋唐的图像题材,在五代两宋持续发展,大量出现在南方地区的宋墓中,带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并成为更具普遍意义的墓葬装饰元素。

关键词:宋代;十二生肖;明器神煞;堪輿;镇墓;镇土

文章编号:1003-2568(2015)06-0090-11

中图分类号:K879

文献标识码:A

作者:邓菲,博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邮编:200433

十二生肖,又称十二属、十二时、十二辰、十二支像等,指代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相配的十二种动物。^①十二生肖的形象在中国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现存的生肖图像大多发现于墓葬之中。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十二生肖像见于北朝,如山东临淄北魏崔氏墓中出土6件灰陶生肖俑,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570年)墓室上栏一周画有生肖动物,残留鼠、牛、虎、兔等彩绘(图1)。^②生肖像通常表现为墓俑、壁画等不同形式,墓志及铜镜上也饰有相关图案。纵观各个时期的生肖材料可知,这类



图1 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墓顶北壁生肖动物图

题材成型于隋代,隋之前多描绘为写实的动物,隋唐时期以兽首人身像最为常见,晚唐五代则开始出现文官形象的生肖人物。另外,十二生肖也可见于日本、朝鲜等地的古坟,是东亚区域内广泛流行的丧葬艺术题材(图2)。^③

学界历来对十二生肖问题关注较多,或探讨生肖的



图2 日本キトラ古坟东壁寅像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原北方地区宋金墓葬艺术研究”(11CKG008)阶段性成果

①生肖的起源很早,与古代天文、数学有密切的关系。古人用十二地支来计算时间、标志方位,代表时间的循环与宇宙各方的无限延伸。后来术家将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配,用于纪年、厌胜、辟邪等多种功用,从而形成了十二生肖。有关十二地支与生肖完整配属的最早文献记载出自东汉王充的《论衡·物势篇》,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代竹简《日书·甲种·盗者篇》、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亡盗章》的陆续出土使得地支配属生肖的出现提前至战国末至秦初的时代。秦简中十二生肖的名称与汉以后的十二禽略有差异,可能为十二生肖初步形成的阶段。

②十二生肖在北朝时期开始成为墓葬中的随葬明器与装饰图案。相关考古报告,参见苏玉琼、蒋英炬《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③7世纪末8世纪初的日本龟虎古坟与キトラ古坟的四壁下部都绘有兽首人身、手持武器的十二生肖像,可能为十二支像与十二神将的融合。8世纪后半期,新罗也出现了十二支像,比如统一新罗时期的庆州金庾信墓、元圣王陵的墓丘护石上都饰有手持戟剑、身着武服的兽首人身浮雕。另外,高丽时代的壁画古坟也出现了十二支像,例如京畿道开丰郡水落岩洞一号坟中的生肖像很接近五代两宋时期的生肖人物。中国、朝鲜、日本等地墓葬中出土的生肖图像反映出东亚范围内葬俗的传播与变化。西嶋定生《中国·朝鲜·日本における十二支像の変迁について》,收于《古代东亚史论集》下卷,吉川弘文馆,1978年,第295—337页;王元林《东亚壁画墓四神十二辰图像的传播》,《中华文化画报》2011年第7期;王元林《东亚地区墓葬壁画十二辰图像的起源与流变》,《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起源,^①或对特定时段内的生肖材料进行类型学研究,^②成果颇丰。然而,从生肖文物的研究来看,目前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以往研究对唐以后的材料重视不足,学者普遍认为生肖题材在五代两宋呈衰落之势;其次,不少研究在分析方法与视角上较为单一,常常集中于墓俑、墓志、铜镜等一类生肖图像,进行类型学划分,讨论演变序列,各类材料之间的比较与联系显得较为薄弱。由于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出土材料越来越形式多样,这也在提示我们系统梳理、综合探讨各类生肖像的必要性。

因此,笔者以两宋时期不同媒材上表现的十二生肖像为对象,进行多类材料的综合研究,探讨生肖题材在唐五代以后的发展与演变。以此在考察考古材料的同时,也在探讨图像的分析方法,试图避免墓葬美术的单一释读,理解图像题材的多元表现与丰富意涵。

一、墓葬中的生肖传统

生肖像出现于北朝,盛行于隋唐,在中古时期的丧葬艺术中相当普遍,既可见于墓志边饰、铜镜图案、石椁线刻,更有数量众多、不同材质的墓俑。隋至初唐时期,两湖等南方地区的墓葬中常随葬有兽首人身的生肖陶俑,如武汉东湖岳家嘴隋墓出土了兽首人身俑,宽衣博带,拱手屈膝盘坐(图3)。^③这种形式从长江流域逐渐向中国北方地区扩散,至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在关中等地流行开来。^④中唐时期的不少

高等级墓葬内都置有兽首人身俑,或按地支序列围绕棺床顺时针排列,或在墓室四壁或左右两壁开设壁龛摆放(图4)。它们在墓室环境中较为固定的空间位置,说明了十二生肖作为方位标志的重要功能。同时,生肖也与

十二时、十二月等时间元素相对应,既呈现空间关系,又表达时间循环,是组构宇宙时空的重要元素。另外,据学者研究,十二生肖还与当坊、当野等镇墓俑一同组合成为《唐会要》中记载的“四神十二时”,具有厌胜、驱邪、保护墓主的功效。^⑤

五代时期的许多高等级墓葬沿袭了长安唐墓的传统,在地下空间中表现十二生肖,只是其形式略有改变。^⑥首先,生肖的形象在晚唐五代经历了从兽首



图3 湖北武昌周家大湾隋墓出土兽首人身坐俑



图4 西安市郊唐墓出土彩绘十二生肖陶俑

①十二生肖的起源问题,古今学人多有关注。虽然有关十二生肖的最初来源分为本土起源与受北方草原民族影响的外来说等,且生肖起源的实质,即为何出现,学术界还有争议。但学者们基本认同,十二生肖的配属在先秦时期已基本成型,至迟在公元1世纪左右就已经形成了十二生肖与十二支相对应的完整理论,并广为流传。例如,沙畹《突厥十二生肖》,收于邢克超选编《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第273—349页;饶宗颐《十二生肖》,收于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3—38页;李学勤《干支纪年与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林梅村《十二生肖源流考》,收于氏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11—129页;李零《十二生肖的起源》,收于氏著《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16—231页,南方熊楠著、栾殿武译《纵谈十二生肖》,中华书局,2006年。等等。

②有关生肖图像的分类研究很多,其中以墓志生肖石刻、生肖俑、生肖镜的类型学研究为主。例如陈安利《古文物中的十二生肖》,《文博》1988年第2期;张蕴《西安地区隋唐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图案》,《唐研究》第8卷,2002年,第395—432页;卢昉《隋至初唐南方墓葬中的生肖俑》,《南方文物》2006年第1期;臧天杰《浅谈唐宋墓葬出土十二时俑》,《青年考古学家》,2006年,第18期;后晓荣、罗贤鹏《十二生肖铜镜初论》,《四川文物》2008年第5期。

③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武汉市东湖岳家嘴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④秦浩最先提出这一观点,认为兽首人身生肖俑起源于南方两湖一带,而后影响至北方,中原地区也开始出现墓中成套放置的生肖俑,参见秦浩《南方唐墓的形制与随葬品》,《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另见卢昉《隋至初唐南方墓葬中的生肖俑》,第81—83页。有学者提出,除了北方唐墓中常见的生肖俑,日本壁画古坟与新罗时代墓葬内外有关十二辰的题材都可能源于隋代的长江流域。这种在特定区域内流行的墓葬内容为何扩散开来,甚至传播至域外,仍有待进一步探讨。相关讨论,见加藤真二《キトラ兽头人身十二支像について》,收于《古坟壁画十二支》,飞鸟资料馆图录,第48册,2008年,第21—36页。

⑤何重华(Judy Chungwa Ho)提出唐墓中的十二生肖具有表示时空方位、辟邪禳福等功能,参见Judy Chungwa Ho, "The Twelve Calendrical Animals in Tang Tombs", in George Kuwayama ed., *Ancient Mortuary Traditions of China: Papers on Chinese Ceramic Funerary Sculptur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1, pp. 62—83. 另见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77—182页。

⑥这类生肖像发现于多个地区的五代时期高等级墓葬。除了康陵外,河北曲阳五代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王处直墓、福建闽国惠宗王延钧之妻刘华墓(930年)、浙江杭州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瓘墓(941年)及次妃吴汉月墓(952年)等都沿用十二生肖题材。上述墓例的考古报告,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第3期。

人身到文官立像的变化;其次,生肖浮雕和彩绘明显增多。例如,浙江临安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吴越国国王钱元瓘元妃马氏康陵后室四壁的小龕内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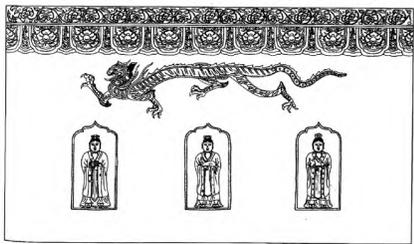


图5 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元妃马氏康陵后室右壁线摹图



图6 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元妃马氏康陵后室十二生肖像

有十二生肖的贴金彩绘浮雕(图5)。生肖人物自左壁正中的子位开始,顺时针方向排列,每像各居一龕,头戴冠,身穿袍服,双手拱于胸前,抱生肖动物于怀中(图6)。^①康陵中生肖像的上方塑四神浮雕,四灵历来具有明确的空间标识性。在该墓中,青龙出现在子像上方,白虎出现在午像之上,朱雀与卯像、玄武与酉像相对。四神与十二生肖在方位上的对应体现二者的空间意味。除此之外,墓室顶部另刻天象图,以单线印刻紫微垣和二十八星宿。整个墓室表现了四神、十二时、二十八星宿等多种时空元素,意图在有限的墓葬环境内塑造无限的宇宙空间。其中十二生肖像不仅占据墓壁上的主要位置,还通过绘塑结合、彩绘贴金的方式,凸显出该题材的重要性。

辽墓也承袭唐代葬俗,出土了不少饰有生肖图案的墓志。^②部分辽墓中还发现生肖俑及壁画,例如

北京大兴辽天庆三年(1113年)墓随葬头顶动物头像的生肖人物俑。^③河北宣化下八里的三座辽墓中都彩绘十二支像,如天庆七年(1117年)张恭诱墓中表现生肖题材,墓顶最内圈为五彩莲花,中心悬挂一枚铜镜,随后由里到外分别为巴比伦黄道十二宫、二十八星宿、日月五星,四周绘身着文官服饰的十二生肖人物。整个墓顶将源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天文符号融汇统一,其中十二生肖作为本土元素,与黄道十二宫一同构成宇宙的图像模式。^④然而,至宋代,原来流行生肖俑像的中原北方地区却难觅其踪。目前仅河南荥阳司村宋墓、孤伯嘴宋墓的墓顶壁画中发现有十二位持笏文吏的形象,虽未附带生肖动物标识,但很有可能是对十二支像的表现(图7)。^⑤生肖题材为何鲜少出现于宋金时期的陕西、河南、山西等地,这是否折射出唐宋时期丧葬习俗的变化?^⑥究其原因,仍有待于更多考古材料的发现与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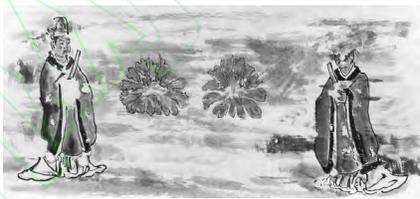


图7 河南荥阳孤伯嘴宋墓墓壁上上部所绘文官人物

二、生肖浮雕与彩绘

十二生肖像几乎在宋金时期的北方地区绝迹,南方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两宋时期的墓葬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形制、内容和装饰上有较大的差异,可分为南北方两大区域。南方地区指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五代时期地方文化的发展,使得该地区又可分为长江下游、中游、上游、闽广等若干个小的区域。^⑦总体来说,南方宋墓具有一定的共性。^⑧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四川等地的宋墓中都发现了生肖图像。^⑨从考古资料来看,生肖俑像在隋至初唐时

①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临安市文物馆《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

②有关辽代墓志生肖图案的研究,参见杨玥《辽代墓志生肖图案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③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等《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妇合葬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⑤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宋金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7—30页。

⑥北方地区的宋墓虽沿袭晚唐五代的墓葬风格,但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仿木结构砖室墓是北方地区最为常见的墓葬形式,为平民所大量使用,墓内饰有砖雕和壁画,以砖雕模仿木构建筑和家具。这些墓葬的尺寸都不大,随葬品较少,大多为碗盏、陶罐类器皿。与唐墓大量随葬陶俑等明器相比,宋墓内的随葬品数量明显减少。这一方面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墓葬内容、形式的变化有关,很多墓葬以壁画砖雕等形式展现家居生活,有的还可能采用纸质偶人明器。秦大树注意到了唐宋之际的葬俗变化,他通过对宋代丧葬习俗的全面考察,提出墓室营建、装饰和随葬制度都体现出地区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多样化。见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49—151页;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体现的社会意义》,《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336页。

⑦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1—158页。

⑧有关南方宋墓共性特征的研究,见吴敬《论南方宋墓的共性特征及其成因》,《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1期。

⑨白彬梳理了隋唐至宋元墓葬中包括十二时俑在内的神煞俑资料,见《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与道教》,收于张勋燎、白彬编著《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第1611—1750页。

期的发端,与南方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①这种墓葬传统在五代两宋时期逐渐回移,再次回归南方地区,只不过生肖材料的分布更为扩散,长江中下游流域、闽赣、四川都成为其传播发展的区域。生肖题材的回归或许与南方地区一直以来流行的礼俗、信仰紧密相关,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唐以后中原政治、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减弱,促进了区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福建尤溪城关第一中学发现的北宋壁画墓中塑有生肖人物浮雕。^②该墓为长方形砖室墓,东西朝向。墓室四壁涂有白灰,之上绘壁画,南北两壁还嵌有浮雕。西壁描绘墓主人的寝室场景;东壁画面漫漶严重,可辨识出门阙题材;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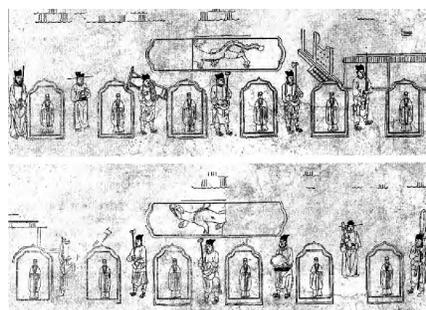


图8 福建尤溪城关一中宋墓南、北两壁壁画浮雕线摹图



图9 福建尤溪城关一中宋墓墓室北壁仪卫与生肖人物

壁画侍奉、仪卫人物6人,上方塑青龙浮雕,仪卫人物之间的壁龛内砌6位持物而立的人物浮雕(图8);南壁同样绘仪卫人物,上塑白虎,壁龛中砌人物浮雕。龛中人像高约30厘米,皆戴冠着袍,足穿翘头尖履,双手拱握于胸前,手中仅存一孔,推测原为木质笏板,现已朽坏(图9)。虽未附带动物元素,但南北两壁12个壁龛中的人物仍可

辨识为十二生肖像。这一时期的生肖像大多以文官形象出现,或头戴动物冠、手持笏板,或手捧生肖动物。从隋代以前的写实动物到隋唐时期的兽首人身像,最后发展为持笏文官,这种变化过程显示出十二生肖形象的逐渐人格化。

实际上,十二生肖并非专门用于丧葬的艺术题材。黄永年曾撰文讨论十二支神像,提出唐宋史料中已出现生肖神化而成的十二支神。^③例如《太平广记》卷三〇一中一段出自唐人《纪闻》的记载提到“未”之神:

开元末,有人好食羊头者,常晨出,有怪在门焉,羊头人身,衣冠甚伟,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属在羊,吾以汝好食羊头,故来求汝,辄食则已,若不尔,吾将杀之。其人大惧,遂不复食。^④

文中的“未”之神以羊头人身之形出现,正是神化的十二生肖之一,其形象与同时期的兽首人身墓俑相吻合。也许因为十二支神本身具有驱邪、护佑的神力,才被制作成明器埋入墓中,在地下世界也扮演着保护墓主的角色。

晚唐以来,这种兽首人身的十二支神进一步拟人化,开始表现为持笏文官的样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S.612正面为《大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年)应天具注历日》,可为生肖神的形象提供佐证。该历日为敦煌地区所制地方历,卷首部分印有雕版图画,表现一名头戴高冠的长者,四周环绕十二位文官形象的人物,头戴生肖动物冠,其中七人持笏,另五人做拱手状(图10)。图像之后记:

右件十二元神,凡人本命之日,于夜静烧银钱、驼马、名香、恭果,并画形供养,必得除灾添寿,故安历史上切宜。^⑤

据研究可知,图中的十二位文官应当是十二元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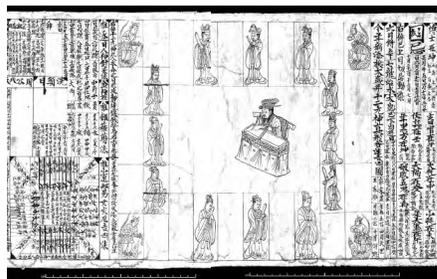


图10 敦煌藏经洞出土S.612《大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年)应天具注历日》局部

①卢昉《隋至初唐南方墓葬中的生肖俑》,《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②福建省博物馆、尤溪县博物馆《福建尤溪发现宋代壁画墓》,《考古》1991年第4期。

③黄永年《〈十二支神像〉补考》,《唐代的十二神——文物随笔》,原载于上海《中央日报·文物周刊》1947-07-27、1948-04-28,收入氏著《茭蒲青果集》,中华书局,2012年,第152—155页,第156—158页。

④[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〇一《神十一·食羊人》,中华书局,2013年,第2392页。

⑤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6页。

心长者当宫值神。画形供生肖元神,可为人消灾益福。^①敦煌历日上十二元辰的造型与晚唐五代以来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人物形象基本一致,似乎说明墓葬中采用此类图像,也许与本命元神信仰有关,元辰所具有的除灾添寿功能,亦有助于护佑墓主的安危福祸。而唐宋时期与十二支神相关的信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其形象的逐步拟人化。

福建尤溪城关一中宋墓中的生肖图案在该地区并非孤例。距离此墓不远的尤溪麻洋宋墓后室左右两壁残存生肖人物彩绘,后室东壁左侧绘一位头戴



图 11 福建尤溪麻洋宋墓后室右壁所绘生肖人物像

羊形冠、持笏而立的人物,其上存墨书“未”字(图 11);右侧人物头戴猴形冠,其上墨书“申”字。这些生肖人物皆立于云端之上,暗示出其神异性。^②除此之外,尤溪梅仙坪寨 2 号壁画墓也绘有头戴兽冠的文官人物,图像样式与城关一中宋墓、麻洋宋墓基本一致,而且也设置于墓葬左右两壁的小龕之中。^③尤溪城关镇埔头村宋墓右室塑十二壁龕,同样砌有人物陶俑,可能为简化版的生肖人像。^④这些图像样式皆可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闽国的高等级墓葬中找到先例。比如尤溪城关宋墓在图像布局方面与康陵十分相似,都以彩绘浮雕的形式在墓壁上表现四神、十二生肖,而生肖用于这些墓葬,也都具有标识方位、避邪镇墓等多种功能。

在观察到不同时代、地域间墓葬关联的同时,我

们也需要注意,这类饰有彩绘浮雕的砖室墓与福建地区的大多数宋墓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不是当地普遍流行的葬俗。福建尤溪、南平、三明等地发现了若干座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的壁画墓。^⑤江西乐平、德安等地也有相同类型的装饰墓,闽赣地区的宋墓壁画无论在内容题材方面,还是在表现方式、绘画风格方面,都颇多相似之处。^⑥然而,这些壁画墓都属于当地的“另类”,可能为中原北方地区流行葬俗的南移,与该时期人口的及迁徙有关,人口流动使得中原文化向南传播至鄱阳湖、闽江流域。^⑦

尤溪城关一中宋墓中的十二生肖像虽见于南方多地,为两宋时期具有区域特征的图像题材。但是,从图像内容来看,该墓既表现了高等级唐墓中的仪卫人物,延续了五代墓葬中对于时空的表达,还描绘了中原北方地区宋墓壁画中常见的门阙、寝室题材。在采用各种元素的同时,墓葬营建者通过壁画、浮雕等多种媒材来表达不同类型的图像题材:生活类场景表现为壁画,四神、十二生肖以突出的浮雕呈现。这使得福建尤溪等地的宋代壁画墓呈现出多元的图像特征,将不同时代、地域中的墓葬传统融汇统一,体现出了南北地区文化与葬俗的交织重叠。

三、生肖墓俑

不同于福建尤溪地区的墓室壁画,木质明器为淮南地区较为流行的随葬器物。江苏地区的一座宋至和二年(1055 年)的宋墓中出土了生肖木俑。该墓中共发现随葬木俑 33 件,均为杉木雕制,包括文武侍俑、四神、十二生肖俑等。大部分木俑钉在木椁四壁:下层为侍俑,中层放置十二生肖,上层为青龙、白虎等四灵。生肖俑残存九件,原有彩绘,色彩现已剥落,皆为人身兽首,着圆领大褂,拱手而立。^⑧此墓中的十二生肖俑形象更接近于隋唐墓中的兽头人身俑,说明该题材在两宋时期不仅存在材质、媒介方面的变化,其形象也不完全相同:以文官形式居多,兽首人身、写实动物偶有发现。

①孙林《唐九宫算、藏族九宫历以及纳西族巴格图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07 年第 2 期。

②杨琮《福建尤溪麻洋宋壁画墓清理简报》,《考古》1989 年第 7 期。

③福建尤溪梅仙宋代壁画墓的资料未见发表,相关信息可见杨琮、林玉芯《闽赣宋墓壁画比较研究》,《南方文物》1993 年第 4 期。

④陈长根《福建尤溪县城关镇埔头村发现北宋纪年壁画墓》,《考古》1995 年第 7 期。

⑤有关福建地区宋元壁画墓的资料梳理与讨论,见杨琮《福建宋元壁画墓初步研究》,《考古》1996 年第 1 期。

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乐平宋代壁画墓》,《文物》1990 年第 3 期。

⑦吴敬认为福建尤溪城关一中宋墓和江西乐平礼林乡宋墓可能是北宋中原士子南下带至当地的葬俗,墓主人在闽赣为官的北方人士。不同区域内“另类”的葬俗体现在墓葬形制与随葬品方面,可以从多个视角探寻宋代的地域文化与文化交流,参见吴敬《福建宋代葬俗的考古学观察》,《福建文博》2010 年第 4 期;吴敬《宋代葬俗迁徙现象及其成因的再探讨》,“中古时期丧葬的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5 年 3 月,第 91—98 页。

⑧苏州博物馆、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文物》1982 年第 12 期。

实际上,墓俑是南方墓葬中更为常见的内容,大部分墓葬倾向于选择立体俑像而非彩绘。江西地区宋墓多以陶俑、瓷俑随葬。例如,江西南丰桑田一座推断为大观政和年间的双室墓中出土大量瓷俑。^①除瓷俑保存完好外,该墓也未受盗扰,使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墓俑的摆放情况。桑田宋墓为夫妻合葬墓,瓷俑集中在男性墓主的墓室壁龛中,墓壁分为上、下两层龛位,上层放置墓主人及神煞俑,伴以2至4件侍者俑。下层龛位摆放12件生肖俑,每件各占一龛,都配有3件侍俑(图12)。桑田宋墓中的生肖俑皆为文臣形象,头戴朝冠,冠顶塑动物头像,部分俑底还有墨书名称(图13)。这在江西地区的墓葬中较为普遍。十二生肖俑常表现为长袖袍服、持笏而立的文官,或在冠上饰有生肖动物,或头戴王字弁帽,手捧十二生肖。至南宋时期,生肖动物的标识逐渐消失,偶尔会在俑像器座的底部书写“子”“丑”“亥”等字样,许多形象较难辨识。动物标识的缺失使得我们对后期生肖图像的了解更具难度。^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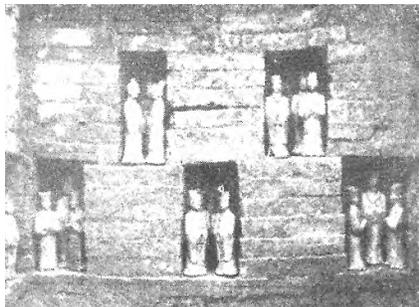


图12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墓室下层小龛



图13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出土生肖俑

另外,从墓中瓷俑的出土情况来看,墓主人、四神、十二生肖、侍从等俑像在当时也存在一定的设置规律。墓主坐俑与四神俑置于上部壁龛;生肖俑虽未按方位顺序排布,但都位于墓壁下层壁龛;侍从俑作为墓主及神煞俑的侍者伴出。各龛内设置一个主要

俑像,以及2到4件体量较小的附属俑。桑田宋墓提供了有关陶俑安放的重要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类型墓俑在墓室空间内的功能与意义。

江西宋墓中出土的俑类以人物侍从俑和明器神煞两类为主。前者对应生活内容的主题,后者为压胜镇墓之用。江西临川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朱济南墓中出土70件陶俑,便是以侍者俑与神煞类墓俑作为主要内容。这些俑烧制较为粗糙,专为墓葬批量生产的模制明器。部分陶俑底部有墨书题记,可知四神、十二时、仰观伏听、张坚固、李定度、张仙人、王公、王母、指路、引路、童子等神煞类型(图14)。^③许多俑都有具体的名称与含义,总体旨在保护墓主灵魂安宁,趋吉避凶。其中王公、王母、指路、引路俑还可能起到指引、接引死者升入仙界的作用。



图14 江西临川南宋朱济南墓出土张坚固、李定度、张仙人俑



图15 江西临川南宋朱济南墓出土十二生肖俑

朱济南墓中共发现20件十二时俑,2套缺4件,皆为持笏文臣形象,头戴“王”字弁帽,着对襟长袍,双手合执,恭身而立(图15)。十二时俑即是生肖俑,也是神煞明器中的“十二元辰”,与其他的神煞俑一样,具有压胜镇墓的重要功能。比如《大汉原陵秘葬经》的“明器神煞篇”中对天子至庶人墓中的随葬明器都有具体的记载。^④其中大夫以下至庶人墓中十二元辰的设置,可以与墓葬出土情况相对比。

十二元辰,长一尺二寸,安十二方位。五呼将长一尺二寸。镇墓五方五精石,镇五方。祖司祖明,长一

①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南丰县博物馆《江西南丰县桑田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

②张丽华《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③陈定荣、徐建昌《江西临川县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

④目前留存的明代以前的地理葬书数量很少,《永乐大典》卷8199、十九庚、陵字内收录了《大汉原陵秘葬经》,此书为金元时期堪舆家张景文所撰的一部完整的非官修地理葬书,可为宋元时期的墓葬形制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相关讨论,参见徐莘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尺二寸，安棺后。仰观伏听，长一尺二寸，安埏道中。当圻当野长一尺二寸。五谷仓一尺二寸。三浆水高九寸，安棺头。金鸡高一尺二寸，安酉地。玉犬长二尺九寸，高一尺，安戌地。蒿里老公，长一尺五寸，安堂西北角。天关二箇，长一尺二寸，安堂南北界上。地轴二箇，长一尺二寸，安堂东西界上。天丧刑祸一对，长二尺，安墓。墓龙长三尺，高一尺二寸，安辰地。金牛长二尺，高一尺二寸，安丑地。玉马高一尺，安午地。铁猪重三十斤，安亥地。四廉路神，长一尺九寸，安四角。已上皆大夫庶人用之吉。^①

除了十二元辰外，临川朱济南墓中出土的仰观、伏听、金鸡、玉犬等也与《秘葬经》中的神煞相对应。^②需要注意的是，在墓中放置神煞类明器的做法沿袭了汉唐时期的墓葬神煞传统，许多类型早有渊源。^③根据白彬对神怪俑的统计，隋至元代共有 60 多种神煞类墓俑，两宋时期就出现了 40 余种，反映出该阶段墓葬神煞的重要发展。^④宋墓中的神煞墓俑已成体系，形成了以四灵、十二时、仰观、伏听、金鸡、玉犬等为基本类型，附加蒿里老人、墓龙、仪鱼等内容的一整套神煞系统，体现出以地下神灵、官僚为主的丧葬空间。

然而，各地在表现神煞方面也不尽相同。例如，随葬俑类也是福建宋墓的一大特点，墓内常放置陶制的十二生肖。南宋在福州地区还流行寿山石俑，包括侍从与神煞明器两大类，石俑的出现与当地寿山石的开采利用有关。^⑤四川地区从北宋中晚期开始流行随葬陶俑，陶俑种类包括武士、文臣、侍从、生肖、四灵俑等。^⑥其中成都平原地区随葬俑类的数量和种

类最多，常达数十或上百个，涵盖了《秘葬经》中的诸多类型。^⑦

江西宋墓中的神煞类墓俑也颇具特色。比如朱济南墓中随葬的张坚固、李定度、^⑧王公、王母俑等都与买地券中常见的卖地人、保见人、书契人相关，手持罗盘、掌堪舆的张仙人又与当地风水堪舆的盛行有一定的联系。总体而言，这类墓俑具有显著的地方特征，部分神煞还可在《荃原总录》、《地理新书》等堪舆著作的谢墓文中找到踪迹，可能受到了堪舆理念、道教观念的影响。

四、堆塑与棺饰中的生肖像

有趣的是，自北宋后期以来，这些神煞类墓俑在闽赣、浙江等地的墓葬中逐渐发生形式上的改变，四灵、生肖等题材开始出现在堆塑瓶、罐类明器之上。^⑨如江西新建王古山的一座北宋晚期墓中出土一件长筒形釉陶器，在其肩部贴塑 12 个动物头部造型，对应环刻“正月”至“十二月”等文字（图 16）。^⑩此时的陶器堆塑还相对简单，仅将动物与月份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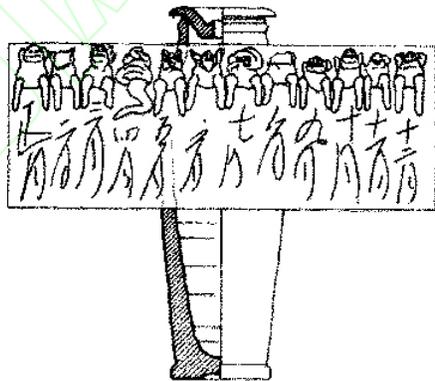


图 16 江西新建王古山宋墓出土堆塑瓶纹饰线摹图

①《大汉原陵秘葬经》，《永乐大典》卷 8199，第 4 册，中华书局影印，1986 年，第 3829 页。

②由于该文成书于金元时期的北方地区，虽然对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的墓俑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可能仅是不同派别地理葬书的一种，无法以此文献简单地附比宋代江西地区的葬俗。

③墓葬神煞的起源很早，是出于对阴间的恐惧而构想出来的地下世界的官僚。他们既是保护亡灵的守卫，又起到监管亡魂的功能。从考古材料来看，这种信仰和实践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汉唐时期墓葬神煞系统的形成与解注、冢讼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为流行于民间的方术迷信，同时具有显著的历史延续性。见余欣《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敦煌学辑刊》2003 年第 1 期。相关讨论，另见郝红星、张倩、李扬《中原唐墓中的明器神煞制度》，《华夏考古》2000 年第 4 期。

④张勋燎、白彬编著《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 年，第 1636 页。

⑤林忠干《福建宋墓分期研究》，《考古》1992 年第 5 期。相关材料的收集，另见李颖《福建五代两宋随葬俑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7—24 页。

⑥陈云洪《四川地区宋代墓葬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 7 辑。

⑦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 158—159 页。

⑧据学者研究，张坚固、李定度的名字最早见于南朝，在唐代以后主要流行于江西、四川、福建等地，主要在买地契约中充当知见人、保人、书契人的角色。道教经籍中虽没有专门记载，但他们作为冢墓的“专职神仙”，具有护佑死者的功能。取“坚固”“定度”之名是为了强调土地买卖的合法性和可信性。相关讨论，参见黄景春《地下神仙张坚固、李定度考述》，《世界宗教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⑨堆塑瓶在闽赣、浙江、湖南等地的宋元墓葬中十分流行，经常成对出现。学者对它们的命名也不尽相同，包括堆塑瓶、立鸟瓶、盖瓶、龙虎瓶、瓶依瓶、魂瓶、谷仓罐等多类名称。以瓶、罐为主体，在器身上堆塑各种造型内容的明器自汉晋以来在长江下游就已经出现。宋元时期的堆塑瓶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五联罐、吴晋谷仓罐、南朝魂瓶。这些器物虽形式各异，但基本功能可能一致，反映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参见刘毅《瓷明器述略》，《东南文化》1994 年增刊第 1 号（《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1994 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⑩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新建王古山宋元墓葬》，《南方文物》2008 年第 4 期。

起来表现十二生肖。

墨书、线刻等文字为确定此类堆塑装饰的含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湖南桂阳刘家岭宋墓的墓室后端壁龛中发现釉陶牛角坛与堆纹罐各一件(图17)。



图17 湖南桂阳刘家岭宋墓出土牛角坛与堆纹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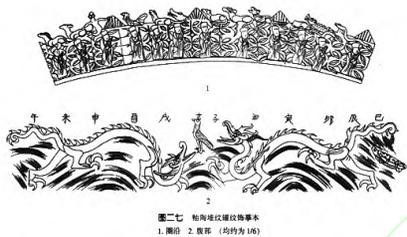


图18 湖南桂阳刘家岭宋墓出土堆纹罐纹饰线摹图

云纹。罐肩部镂刻一圈花瓣纹,纹上贴十二个持笏人物立像等。人物上方分布生肖动物泥塑,下方还配有“子”“丑”“寅”等对应文字(图18),明确标明十二个人物立像为生肖题材。^①

堆塑瓶在南宋以后日趋复杂,瓶颈也越变越长,饰有相当完整的神煞图像。江西清江县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王宣义墓出土一对影青釉瓷堆塑瓶,瓶肩上有十二个人物立俑及一个跪拜俑,颈部饰男性人物坐俑,以及青龙、白虎、玄武、朱雀、观风鸟、玉马、金鸡玉犬、日月、祥云等堆贴(图19)。②其中的十二人物立像代表了十二生肖,通过围绕堆塑瓶一周表现出时空的循环往复,同时作为十二支神的化身,具有驱邪镇守、保卫墓主亡灵的功能。跪拜俑以伏拜形象出现,为神煞俑“伏听”,在墓中也起到守卫墓主的作用。其他的装饰元素也各具内涵。从堆塑瓶上的装饰来看,大多数堆贴与镇墓神煞类元素相关,似乎取代了单个墓俑,将多类“神煞明器”简化缩小、集于一身。^③

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桂阳刘家岭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2期。

②薛尧《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年第11期。

③杨后礼对堆塑瓶上的主要装饰元素进行总结,将其与《秘葬经》中记载的大夫以下至庶人坟墓中的明器神煞相对照,指出二者基本吻合。杨后礼《江西宋元纪年墓出土堆塑长瓶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④陈定荣、徐建昌《江西临川县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

北宋后期装饰较为简单的堆塑瓶,逐渐发展为南宋时期各类神煞题材、云朵、仰莲托座的复杂样式(图20)。这类堆塑瓶在江西、福建的南宋、元墓中几乎每墓必出,是最为流行的随葬明器。一些墓葬还出土了相同题材的墓俑与堆塑瓶。上文提到的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朱济南墓中随葬四灵、十二时等神煞俑,墓内另出土了4件青白瓷堆塑瓶,形体修长,通体施青白釉,瓶体颈部饰有龙虎、十二人物立像、金鸡、玉犬等,十二人物堆贴是对生肖题材另外一种形式的呈现。^④墓俑与堆塑瓶二者伴出的情况有可能源于墓葬对于不同类型明器的采用,同时也显示出明器神煞在地下空间中的重要意义。



图19 江西清江县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墓出土堆塑瓶



图20 江西乐安南宋墓出土青白釉堆塑瓶

学者们对堆塑瓶、多角罐等明器的功能和象征含义有着不同的推测,有的视此类明器为魂瓶,认为它们具有引导亡魂升天的功能;有的将这类器物作

为谷仓,代表死后世界的丰衣足食;还有的学者提出堆塑瓶上的内容包含有宗教因素,寄托了生者对亡灵的祈祷,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①如果从堆贴内容的角度来考虑,堆塑瓶又可分为多种“明器神煞”的综合体,在集约化墓葬内容、简化葬制的同时,兼顾引魂、镇墓、护佑墓主等多重意涵。宋元随葬墓俑的减少曾被视为明器使用的衰落,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堆塑瓶类器物的变化体现出该时期墓葬明器的新发展,说明当时人对随葬明器有了新的认识,从隋唐时期的墓俑转变为宋元时期采用各种方式以示意。墓葬神煞也许并非完全衰微。^②

生肖题材除了作为堆塑瓶上的装饰元素外,还以其他形式出现在南方葬俗之中。广东地区宋墓中的瓷棺常以彩绘代替神煞俑。如广东海康县雷城镇上坡村宋墓中发现了两件彩绘瓷棺,两棺均呈长方形,弧形顶,后有插板可以开启,装饰图案基本相同(图21)。女性墓主瓷棺棺顶前后两端用褐色彩画双



图 21 广东海康县雷城镇上坡村宋墓出土彩绘瓷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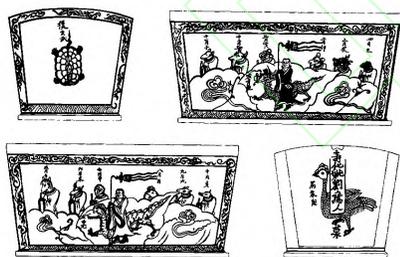


图 22 广东海康县雷城镇上坡村宋墓出土瓷棺彩绘线摹图

线莲瓣纹,前端莲瓣纹内写“地户”两字,后端写有“天门”。棺左壁中央绘一位持幡童子身骑青龙,青龙前竖写“左青龙”。童子一侧画鼠、牛、虎、兔、龙、蛇生肖像,均作兽首人身,身穿长袍,持笏立于云雾之中,各像顶部分别对应“十一月子”“十二月

丑”“正月寅”“二月卯”等生肖所属月份(图22)。右壁中央绘童子持幡骑于虎背之上,白虎前写“右白虎”三字,童子一侧画马、羊、猴、鸡等生肖,生肖造型与左壁相同,顶部书写“五月午”“六月未”等字样。棺后壁画玄武,旁边写有“后玄武”三字;棺前画朱雀,旁书“前朱雀”;中间写“寿化妣刘三孺人墓”,标明墓主身份。^③

广东雷州地区南宋以后的火葬墓多使用此类釉下褐彩装饰的瓷棺。瓷棺的形式在其他地区并不多见,但在闽南地区却是例外,唐宋以来许多闽人迁徙至雷州半岛,可能也将相关风俗带至海康。两件瓷棺都以四神、十二生肖的元素装饰,在图像题材上仍然延续了唐五代以来的墓葬传统。十二生肖像出现于云雾之中,与“天门”“地户”、持幡仙人的形象配合,颇有十二支神之意,起到护佑墓主之用。

从五代康陵中顺时针在墓室四壁表现十二生肖浮雕,到江西南丰宋墓墓壁下方小龕中摆放十二生肖俑,再至江西、福建宋墓中饰有十二生肖元素的堆塑瓶,我们可以看到10世纪以来的南方墓葬在图像表现方面具有多种选择,通过不同的视觉手段来塑造墓主人的地下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随着材质与形式的改变,生肖图像在时空方位上的呈现似乎逐渐减弱,随之而来的是与丧葬制度中神煞明器内容的紧密结合,更为强调生肖的厌胜、护佑、辟邪、镇墓功能,反映出了南方地区独特的丧葬礼俗与死后信仰。

五、生肖石刻

上文主要讨论了两宋时期十二生肖像在南方墓葬中的多元表现。这类题材虽然在同时期中原北方地区的墓葬中鲜少出现,但却在北宋巩义帝陵的陵园内发现了部分特例。

根据巩县宋陵的调查报告可知,近年来,宋陵陵区内陆续发现8件生肖石像。这些石像的造型分别为狗、鼠、牛、猪、兔、鸡、龙和猴,基本形状相似,石刻下部雕成石座,座上蹲卧或爬伏一只动物。^④与同时期南方墓葬中流行的持笏人物俑不同,这些石刻都

①一些学者已对堆塑瓶、罐进行过专题研究,从不同角度梳理了这类明器的时代特征、分布情况、文化内涵。例如,陈定荣《堆塑瓶论》,《南方文物》1986年第3期;陈定荣《谷仓罐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杨后礼《江西宋元纪年墓出土堆塑长瓶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黄义军《南方地区宋墓出土的盘口瓶和多角坛的分区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汤苏婴《浙江宋代青瓷堆塑瓶初探》,收于《浙江省博物馆论文集(1999—2009)》,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第96—101页;臧天杰《墓葬出土堆塑瓶(罐)类明器功用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彭友琴《宋元明时期江南地区魂瓶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②相关讨论,见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臧天杰《墓葬出土堆塑瓶(罐)类明器功用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③广东省博物馆等编《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9年,第66页。

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7—409页。

是以动物形象直接表现十二生肖，而且均出土于各陵、墓的神墙四周。如宋真宗永定陵西神墙外北部出土了1件青石质石狗。石狗基座为须弥座，表面磨光，座上蹲卧一狗，翘首垂耳，屈腿卷尾(图23)。其余



图23 河南巩县永定陵西神墙外出土石狗

7件生肖石刻发现于永裕和永泰陵区，除1件出土地点不明外，另外6件分属钦圣宪肃向皇后陵、钦成朱皇后陵、昭怀刘皇后陵和商国公主墓。例如，钦圣宪肃向皇后陵北神墙外发现石鼠、石牛各1件，为青石质，座呈长方体，座下部雕刻

宝山纹。商国公主墓北侧出土石龙1件，西侧出土石鸡1件。

从上述发现可知，生肖石刻通常为单独或零散瘞埋，并不像十二时俑那般成套放置。这些石刻均位于各陵园或墓园神墙外四周，皆埋于地表下1米左右。例如，商国公主墓的石龙发现于一方形土坑内，坑内仅容纳一龙，四壁以细泥抹光，说明这些单个的生肖石刻并不是随意置于陵区之外，而是有意填埋的结果。另外，不



图24 巩县钦成朱皇后陵神墙外出土五色石猪

仅帝、后陵园周围设置生肖石刻，亲王、公主墓园也埋有生肖石兽。帝陵生肖使用青石，动物下置须弥座；后陵的生肖石像也采用青石，石座下部磨光，上部雕宝山纹，有的表面还施有红、绿彩绘，以表现五色石(图24)；公主墓的石刻为红石质，其体量也稍小于帝后陵园出土石像，石刻本身也可体现出北宋皇陵的等级制度。^①

有学者提出，这些生肖石刻与唐代墓葬内随葬生肖俑一样，寓有十二时之意。^②但实际上，这种瘞埋于陵园外的生肖石刻可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十二时俑。据文献记载，北宋皇陵地宫内随葬有十二时俑等镇墓类明器。《宋史》卷一二二《礼二十五》中记载：

山陵、谥祔、服纪、葬仪与士庶之丧制为凶礼。……太祖建国，号僖祖曰钦陵，顺祖曰康陵，翼祖曰定陵，宣祖曰安陵。……乾德初，改卜河南府巩县西南四十里訾乡邓封村。……进玄宫有铁帐覆梓宫，藉以棕桐褥，铁盆、铁山用然漆灯。宣祖衮冕，昭宪皇后花钗、翠衣，赠玉。十二神、当圻、当野、祖明、祖思、地轴及留陵刻漏等，并制如仪。^③

上述文字说明自宋代初年开始，帝后陵寝中随葬十二时、十二神已成定制。又如李攸的《宋朝事实》记录了英宗永厚陵中随葬品的安设情况，在梓宫内“别置五星十二辰及祖思、祖明尊位”^④。既然地宫内已设置十二元辰，那么陵园外的生肖石刻是否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宋会要辑稿》礼二九曾提及帝陵瘞埋生肖石刻之事：

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二十四日，保章正冯士安、魏成象等言：“臣闻祖宗朝尝于永熙陵东西三男位筑堤以镇土，已获感应。今可于永厚陵及濮安懿王园东寅、卯、辰三位天柱寿山行镇土之术，仍乞于镇土堤逐方位，以珍宝玉石为兽埋之。”^⑤

虽然目前尚未在太宗永熙陵、英宗永厚陵及濮安懿王墓园附近发现用作镇土的石兽，但永定陵及钦圣宪肃等后陵出土的生肖石刻可能具有同类功用。宋代帝陵有着十分严格的营建程序，从皇陵选址到入葬，皆与堪輿有着密切的联系。^⑥例如，在永定陵修建时，因山陵都监雷允恭等擅移已勘定的陵穴，开凿之后堂下涌水，工期延迟，使得有关官员被诛被贬。因

①秦大树《试论北宋皇陵的等级制度》，《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8—409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二《礼二十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2847—2848页。

④[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三《仪注三·英宗葬永厚陵》，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08册，第158页。

⑤[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三七之一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1325页。

⑥有关堪輿学对宋陵营建的影响，参见冯继仁《论阴阳堪輿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文物》1994年第8期。

此变故,诏用原穴,之后又“内降《镇墓法》《五精石镇墓法》《谢墓法》,令山陵修奉司委在彼祇应人将阴阳文字看详,如得允当,即依逐件事理,候至时精洁镇谢”^①,似乎正是为了应对皇堂穿凿之事,以阴阳堪輿之术进行补救处理。

以玉石为兽瘞的镇厌之法也运用于永裕等陵墓的修建:

其镇土事,令众官详定申中书。四月五日,提举补治所言:“永裕陵三男阳气子孙位合瘞埋玉兽,重迭镇助。”从之。^②

在永裕、永泰陵后陵的陵园四周地下1米处都曾发现生肖石刻,可能就是用于厌胜镇土之物。这些石兽都是在诸陵、墓园建成之后掩埋于地下的,而且其陈设方位也与十二辰位相对应。虽然与墓中按方位放置十二生肖俑的形式相同,但它们的功能需要区别于代表时间方位、保护墓主的生肖俑,可能为犯忌救弊之法,是为应对陵墓局部地势不利而填埋的风水镇物。^③

这种瘞埋生肖石刻的做法也许源自更早的陵墓传统。例如,考古工作人员曾在陕西礼泉唐肃宗李亨建陵(763年)的陵园内城门外发现过两件生肖石俑,俑以白色石灰岩雕凿,兽首人身,持笏立于方形基座上(图25)。马首人身俑出土于建陵朱雀门石狮东侧,



图25 陕西礼泉唐肃宗李亨建陵内城门外出土午马、申猴立俑

猴兽人身俑出土于建陵白虎门西南方向。^④在大致方位上,午马在南,申猴在西南,与十二辰位相对应。另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2009年

西安咸阳机场扩建过程中发现了一座带有围沟的大型唐墓,该墓的围沟中出土了11件通高60厘米、遍施彩绘的兽首人身生肖俑,出土位置明确,均按照子午顺序整齐排列。^⑤上述两则考古发现都不同于墓室内随葬十二生肖俑的丧葬传统,更接近于宋陵神墙外瘞埋石兽的做法。这说明在唐代就可能已经出现了墓内安放与陵园设置生肖俑像的不同系统,茱域内出土的生肖俑也许与葬仪、堪輿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至于巩县皇陵的生肖石刻是否来源于此,仍有待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

结 语

生肖题材源于北朝、盛行于隋唐,在五代两宋时期仍然持续发展,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墓葬内容。本文的前三则案例显示,该题材在两宋时期的南方墓葬中拥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后一例为北宋皇陵的生肖石刻,将讨论的空间从墓室内部扩展到了茱域范围,为理解生肖材料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两类生肖图像虽属于墓内随葬品与陵园规划的不同体系,但总体而言,宋代葬俗的很多方面,例如墓地选址、随葬明器等,都与堪輿理念关系密切。这种联系也是两宋时期十二生肖图像的显著特征,体现出阴阳堪輿在丧葬礼俗方面的影响。与隋唐时期的生肖俑像相比,两宋墓葬出土的生肖图像在数量及质量上都日渐式微,但这并非简单的衰落。事实上十二生肖题材仍旧在继续发展,从唐五代时期流行于高等级墓葬中的时空元素,转化成为更具普遍意义的墓葬装饰图案,作为神煞题材大量出现在南方地区中下层民众的墓葬中。通过对不同类型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我们既可以进行墓葬内图像的原境分析,又能够涉及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尤其可以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生肖题材在不同地域间的变化与发展,透过这些材料了解当时当地的丧葬礼俗与死后信仰。

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三七之八,中华书局,1957年,第1323页

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三七之三六,中华书局,1957年,第1337页。

③刘毅在讨论宋代皇陵中的生肖石刻时,最先提出了石像用作镇土的观点。刘毅《唐季以来帝王世俗化葬仪用品探微》,《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目前有关厌胜镇土的研究相对较少,讨论多见于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堪輿术研究,其中涉及石镇等犯忌救弊之法,参见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212—257页;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研究》,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年;关长龙《敦煌本堪輿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第114—128页。

④李浪涛《唐肃宗建陵出土石生肖俑》,《文物》2003年第1期。

⑤西安咸阳机场唐墓的考古报告尚未发表,相关信息可见中国新闻网2010年2月的报道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0-02/03/content_19364270.htm。